

# 陈炯明与蒋介石

乔忠荣

在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后半段，陈炯明、蒋介石曾先后是他倚畀甚重的人物。从当时情况看，他们在政治立场、思想主张、行动口号都迥然不同，却先后都背叛了他的事业。前者让孙中山感受到了一生斗争的最大失败；后者也在他长逝后背离了其主义政策。因此，对陈炯明与蒋介石作一番历史性的比较与研究，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此二人的了解。

让我们首先勾勒一幅陈炯明、蒋介石的个人行为及交往轨迹。

陈炯明出身于一个由传统的地主士绅家庭向近代转化的绅商家庭。“陈氏本海丰巨族，生齿蕃息”，“素业贾，贩鴉卵，往来港惠间<sup>①</sup>。由于所处的广东地理环境及当时的社会环境，陈炯明感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尽管在他20岁时考中了秀才，却并没有沿着旧的科举道路走下去，忧时愤俗，“与同乡青年人士，互相研讨时事”<sup>②</sup>，清政日窳，思想日新，已处于由封建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的过渡状态中。

陈炯明的思想发展很快，到了1909年底，他已由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转向资产阶级立宪派再转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并加入了同盟会。他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和淡水起义，也正是在淡水举义中，他开始掌握了军队，即“循军”，这是陈炯明的起家军队，“凡有往总司令部投效的，广为录用”<sup>③</sup>，拥兵自雄的思想已开始萌发。从此，他以军事实力派的形象出现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阵营里，是广东革命党人中最有军事实力和影响的人物。

陈炯明军事集团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的，“二次革命”期间，陈炯明的军事力量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下，内讧陡起，全军尽墨。后来只因利用孙中山的影响以及朱执信、邓铿等人在广东的基础才卷土重来，却又在讨袁后，在北洋政府压迫下，又被迫将兵权尽释于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而他则在左右逢源之中处处碰壁。

尽管孙中山对陈炯明这一阶段的表现并不满意甚至气愤，但对他还是采取了爱护的态度。希望他“慎毋瞻徇顾忌，姑息爱人，致堕入陷阱也”<sup>④</sup>。因此，当陈炯明再度投奔到“护法”旗下，表示“竭诚拥护”，孙中山就立即捐弃前嫌，寄予厚望了。

孙中山尽了自己最大能力和影响，又使陈炯明交出去的军队重新以援闽粤军的形式又回到陈炯明的麾下，而陈炯明的表现也一度让孙中山感到满意。援闽粤军是当时国民军中硕果仅存的革命武装，陈炯明首先提出了“整军经武”的口号，致力漳州新政。这就迎合了孙中山的心愿，并采取了鼓励支持的态度。孙在1918年12月致陈炯明函中就表示：“兄在闽措施，既切近时需，而规划又复宏远，闻之曷胜欣喜”<sup>⑤</sup>。朱执信、廖仲恺、许崇智、戴季陶等随

后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漳州，协助陈炯明的工作，“时同志多集中闽南，于党义宣传，地方改革，卓著成效”<sup>⑥</sup>。陈炯明在漳州的努力，不仅使粤军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在刷新风俗，创办教育、宣传思想、整顿市政、发展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深获孙中山的赞赏。

随着陈炯明政治威望和军事力量的提高与加强，其个人野心也随之膨胀，在一些政策方针上与孙中山格格不入。特别在北伐问题上，陈炯明采取了极力反对的态度，最后竟发展到公然拥兵叛乱，走向了革命的反面。陈炯明发动叛乱之时，正是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地位开始崛起的一个标志，并获得了孙中山的高度信任。

蒋介石对陈炯明一直心存芥蒂。尽管与国民党内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资历相比，陈炯明显得浅薄，但较之蒋介石，却又算得前辈人物。当蒋介石被派到陈炯明部队工作时，他仅是被作为助手、部属而使用的。既然蒋介石被孙中山作为军事人才而重视，那么，只要有陈炯明在，就是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另外，陈炯明与蒋介石共事之初，就采取了排斥的态度，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后，“总理在广东唯一的力量，就是陈炯明的部队。总理为求联系的密切，一定要本人去主持陈部的作战业务”<sup>⑦</sup>。蒋介石于是被派往担任了陈炯明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

为了保持部队的私人属性，陈炯明对孙中山派去的人一再持排挤态度，其部将“叶举、翁式亮等皆嫉视，并尝诋毁总理”，蒋介石数度欲离职而去。在大埔攻防战中，蒋介石一显身手，赢得了胜利，也加强了自信。毛思诚在《蒋介石年谱》中曾有记述：

五月，会议攻闽计划，公主张移营三河坝，群起反对，及公详陈战略集中理由，始各无言。闽战迭获胜，上杭、大埔相继克复，而以永定一役为尤烈。相并数日，公恐许（崇智）失利，乃驰往前线而告方略，翌日即下。是时韩江上流水发，闽军败溃者多遭淹毙，李厚基大惊，乃急驱其左翼军牵制潮汕。第一师师长邓铿，以将不受命，且众寡势殊，弃去汕头。公电止之，铿整队复进。同时闽军右翼反攻大埔，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退守三河坝，敌军跟踪至。炯明与其左右准备退却，至是始一以委公。公遂以总司令名义，急调右翼之洪兆麟部来援，幸敌军以地形不熟，中止进行。及与洪部会合，乃下令奋击，亲冒火线督战，敌即崩溃。是役也，公视察地形，布置阵地要害，先一夕，率炮兵登山放射列，指挥炮击，一一命中，部下几视为神，而不知公为炮科出身也。自此叶举，翁式亮等，益忌公而挤之。公径赴汕头，向总司令辞职回沪。

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在大埔之战中，初露锋芒，使陈炯明对其另眼相看，他在致蒋函中称：“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对蒋很是推许。

但是，陈炯明此举仅仅是从指挥作战才能的角度去对待蒋介石的，他需要的仅是一位高级军事幕僚或参谋人员，这在他于1918年3月24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得非常清楚，“现在诸事纷烦，非得人莫办，弟幕中有几人胜任，兄所深知，惟望早日回埔，共襄大计。是为切要，不尽欲言也”。因此，尽管陈炯明一再挽留，孙中山几度劝慰，蒋介石还是去了上海。陈炯明摸透了蒋介石心理，他在8月31日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开出了十分吸引人的条件。

……吾党实力，只此一军，若非得二三中坚人物，则仍无永久存立之望。此间情形，能助我者实寥如晨星。……中孚枪三千，如购得，决定发与吾兄，练一中坚军队。……总之粤军须有中坚军队，以资控制，庶可建威销萌，立于强固不拔之地。此项将官非有道德可言之人，实难倚恃，故三千枪之成功，决定交负此重任也。前函训练干部，极为扼要，当及时图之。经飭参谋处筹议，最好赴沪归省，能早日回部，即可计划此中坚军队之进行。此节祈密。暗底练成一旅训练最精枪械最良部队，以为全军之冠，则基础自固矣。

陈炯明为蒋介石画饼充饥，却让蒋介石怦然心动。其实，蒋离开粤军的最大原因，就是

军中地域观念，私人属性甚重。作为一个“外江人”，他并不能掌握军队，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能有机会训练一支自己的军队，则是他此时最大的心愿。

但事与愿违，尽管蒋介石返回粤军后，陈炯明任他为第二支队司令官，但对他的防范却更明显，“拨最亲信梁鸿楷、丘耀西二统领所部归其指挥，仅千人”<sup>⑤</sup>。在以后不久发生的永泰之战中，蒋介石抱病上阵，“而梁（鸿楷）、丘（耀西）各部，又不遵令，擅自退却，及至申刻，敌军枪弹猛射入城，乃知前方部队已经逃遁，及敌军炮入城中，中正只身冲围而出”<sup>⑥</sup>。此战的失败，使蒋介石更深刻地认识到训练统驭军队的重要性，也使他与陈炯明之间的裂痕更深化了一步。他后来一再拒绝陈炯明的邀请而宁愿与一贯与陈炯明有矛盾的许崇智互相接纳，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示。

由于蒋介石曾亲身体验其中三昧，因此，对陈炯明及其军阀形象化认识得更为清晰，他曾告诫孙中山：“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sup>⑦</sup>。他自己也在后来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中称“所发现陈炯明谋害总统之事实，其历历可数者，不下六七次”。

蒋介石对陈炯明的恶感也与日俱增，1921年，他去会见陈炯明，“抵南宁，往见陈总司令，听其言，殊不可耐，忍怒出，即搭船离邕。船次，因念本党之无人，中师之徒苦，惋咨不置，乃致书炯明，答复其何以甘心为现选为大总统共事一语”<sup>⑧</sup>。对陈炯明厌恶之心溢于言表。

陈炯明对蒋介石也心存戒备之心，曾说蒋在孙中山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而对他不利<sup>⑨</sup>。

纵观蒋介石这一时期与陈炯明的书信往来，也都就事论事，殊少亲热，当是事实。

因此，蒋介石一再建议孙中山对陈炯明采取强硬手段，认为他“竟图谋叛，逆迹已彰，莫如尽速予以讨平，俾先巩固广东，再谋北伐，是为上策”<sup>⑩</sup>，但孙中山对他这一建议未予采纳。

陈炯明谋反行动发生后，蒋介石间关赴难，从邕沪迅速赶到孙中山避难之永丰舰。此举让孙中山大为欣慰，并从此获得信任和提携，后来还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从此开始崛起。孙中山离粤及逝世后，蒋带军进行了两次东征，驱逐了陈炯明，巩固了广东根据地。随着个人声望的提高和权力掌握。他逐渐背离了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接连发动了“三·二〇”事件，“整理党务案”，以及在国民党“二大”中名声大噪。终于逐渐篡夺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尽管他的行动以及思想和陈炯明的表现方式截然不同，但在背叛孙中山这一点上却是殊途同归。

## 二

尽管陈炯明与蒋介石在其共事的期间表现为矛盾和龃龉的两方面，但仔细观察，两人之间在诸多方面却存有共同之处。

1、陈炯明与蒋介石都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想 and 意识。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时，陈炯明“已起救国之思”，“时与有志之士，互相研究兵学，以备有用”<sup>⑪</sup>。在法政学堂求学时，由于陈时常流露出对现状不满之态，并有志于社会改革，朱执信已对他另眼相看，夸赞他“品学兼优，热心国事”。而他投身同盟会，参加黄花岗起义，加入“支那暗杀团”，发动“淡水起义”，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征和体现。

蒋介石也有上述的特点，他16岁入奉化县城凤麓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参加要求“改革教育”的学潮运动。1906年，他出洋留学前，愤然剪下自己辫子，“全族以为大不敬，乡人骇然”。在日本期间，他有一首七言绝句很能代表其思想：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一些革命书籍无疑对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公见邹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寝则抱怀，梦寐间如见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其醉心民族主义如此”<sup>⑧</sup>。

正因为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陈炯明与蒋介石都能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暂时地聚集在一个共同旗帜下共事。

2、陈炯明与蒋介石都曾以左派革命者面目出现，并赢得了较高的声誉，掌握了一定的实力。陈炯明素怀改良社会抱负而阴鸷好名<sup>⑨</sup>。他在漳州主政期间，积极刷新政治，支持“五四运动”，他发表公电称：“青岛问题失败，强权制胜公理，植扰乱国际和平之种子共谋国际和平之时，五载战争，竟结此果。巴黎和会尚成何用？吾人处此，不独为自卫计，当抵死力争，即为世界永久安全计，亦宜表示各联盟加入国，俾速觉悟。今北京诸生本爱国之热诚，为诛奸之义举，正本清源，人神共快，此诚浩气所钟，国魂所托”<sup>⑩</sup>。在陈炯明支持下，漳州的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各县联合宣言经陈炯明转电达北京，宣称“青岛问题，关系至重，倘若屈服，则中国永无独立国资格。当公理正义伸张之时，犹有此辱国丧权之事，而今而后，国奚以存，伏望诸公坚决主持，勿稍挠屈。闽中民气愤慨甚深，一息尚存，断难隐忍”<sup>⑪</sup>。

陈炯明在漳州还广泛开展新文化宣传运动，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在漳州广泛流行、传播。特别是创办了《闽星》半周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发表了许多热情讴歌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文章，陈炯明在漳州的业绩，获得了很多赞誉，连列宁都表示了很高的评价，有的甚至称：“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sup>⑫</sup>。陈炯明自己也在由朱执信代笔的致列宁函中，表示“我深深相信新的俄国对中国即将到来的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期望“新的中国和新的俄国将如兄弟友谊般地携手共进”；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而他本人将“想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这一制度”，“不仅是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部亚洲”<sup>⑬</sup>。

陈炯明在军事上也有显著成绩，“援闽粤军”组成后，进军潮汕，规联闽南，返师广东，驱逐桂系。作为直接的军事指挥官，他的功劳不能一笔抹煞。因此，在广东政府及军界中，一时无出其右者。

陈炯明叛变后，蒋介石则继之成了广东政府军事上的重要人物，孙中山指派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关于蒋介石在黄埔时的表现，所有的回忆均承认他此段期间的工作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在短短的一年多期间，就训练出一批战无不胜、朝气蓬勃的精锐之军，并培养了相当一批人才。在平定商团，二次东征以及统一巩固广东根据地的历次战争中，获得了很高声誉。孙中山在北京病榻上闻听广东前线捷报，“不胜欣慰，并谕代电奖勉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sup>⑭</sup>。胡汉民也发电致意，称“尤以教导团军纪之肃，战斗之勇，出于意表，盖显兄等平日训导之功”<sup>⑮</sup>。

广东国民政府电文也竭尽表彰之词：“接诵捷报，欣慰莫如。我兄以十月六日自广州启节，至十一月六日而税驾汕头，屈指行程恰盈一月，群贼就歼，东江大定，破惠州之天险，覆逆敌之穴巢，乃在罗经坝出奇制胜，使群贼敛手受擒，无能漏网，尤为此次战役中最有特色之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sup>⑯</sup>。

东征胜利后，蒋介石威望大振。1925年11月，蒋介石率军班师回营，沿途欢呼声不绝于耳。请看记载：

11月4日、午八时，公由鲤湖启节，士女簇围，争瞻伟度，靡行旅各安如常。午后二时，到普宁城，人山人海，欢娱鼓舞之状，难以形容。

5日，上午八时，公由普宁乘舰，十时，过广大圩，沿途群众聚萍，欢声震动。一时，蒞揭阳城，万人空巷，兴高采烈。驻节于县议会。公谓自行军以来，以为最佳现象。

6日，汕头欢迎各代表，由揭阳拥公及其军属下舰启程。……午后一时，抵码头，各团体整列，仪容甚盛，民众簇观，万头攒动，沿途军乐悠扬，鞭炮哗喇，各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沿外马路经崎碌总指挥部，入憩片时，旋出向众辞谢。<sup>②</sup>

蒋介石威望日隆，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就有“某同志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并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sup>③</sup>。在大会选举中，蒋介石得票248，只比得票最多的汪精卫少一票<sup>④</sup>。

蒋介石的思想一度曾表现为“左派”的倾向，他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中慷慨言到：

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之旗下，以实行吾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愿死于青天白日之旗下，吾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吾愿与党先死者诸同志，同穴安眠于地下，吾愿本党内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始终生死，本我亲爱精诚之校训，团结精神，继续我先死者之事业，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三民主义成功，与共产主义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也。

蒋介石当时类似此种言行，左派言论，在革命阵线中，一时被视为同路人。

3. 陈炯明与蒋介石都具有振兴门楣，出入头地的个人野心以及性格上的专擅自为。

陈炯明虽出身书香世家，然而其父中举后三年即辞世，陈氏门庭因而中衰。家境遽变，使幼年的陈炯明心理和个性的发展都受到很大的刺激，较早地尝受到世态的炎凉和艰辛，养成了一种发愤自立的思想。与以往顽闹的个性截然一变，少年老成，“笑言不苟，劬于学，慨然有用世志”，弱冠即攀登科举道路。尽管由于形势的变化，使他未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是个人野心却更加发达。因此，当他沿着革命道路迈步的时候，现实社会中却为他创造了与他怀有的个人奋斗之思想相适应，相诱发的蜕化为军阀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他掌握了军权后，这种野心就更为炽烈，使它在私人属性上倾象性越益增浓。因此有人评价他说：“从社会观察，陈氏好谈社会主义，动辄以打破私有制相号召，惟政权必垄断于海陆丰，军权必集中于陈家将”<sup>⑤</sup>。陈炯明在漳州主政时，就有充分暴露，他采用军民合治制，总司令为军民最高统治者，实际上已成了闽南的“王权”所在，一切地方官吏都得由他委派，并有意识树立个人威信，在漳州，一些街道以他在北洋政府时被授予的“定威”将军或其笔名命名，他的部下甚至在公开场合也高呼“粤军总司令万岁”。他的这种个人野心的滋长，使他越来越向军阀割据的方向倾斜。

蒋介石早年的家境也比较优渥，但自父亲歿后，门祚式微，倍受欺凌，“乡有无主滞粮，县官令甲首中户摊派，公家与焉，庄书喉里正滑故加苛派，差役票传到案，勒迫承认，王太夫人以为奇辱”<sup>⑥</sup>。孤儿寡母的悲惨遭遇，使蒋介石个人奋斗，光大门楣之志油然而生。他幼年饱读诗书，一生对儒家思想，尤其是以孟子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尤为服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入世”，济则兼达天下，不济独善其身，天降大任于斯人矣。因此早年的蒋介石，就很注意修养身性，磨练意志，虽则顽皮，“迨伏案读书，或握管构思，虽百纷囂然于其侧，冥无所觉”<sup>⑦</sup>。蒋介石之性格倔强、坚强，也是后来人所共知的。

蒋介石投靠孙中山，特别是陈炯明叛变后，成为孙中山军事上重要助手，他的野心暴露

日显。孙中山让他主持筹办黄埔军校伊始，他却撒手而去，并准备解散黄埔军校筹备班子。蒋介石这一举动，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孙中山让他专心办学，不要过问党政事务，这就不为蒋介石所能忍受的，他在1925年2月给孙中山信中，已毫无掩饰地表示不满：

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退战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境，必能维持现状，从无不能成军之时，更不知有元首罹险不知下落之奇闻。

他在批评孙中山对他不够重视：

倘偏听谄谀，轻信浮夸，而不验其智愚，察其虚实，则蟠木轮囷，将有万乘之器，而隋珠合璧，莫不为其按剑相眄，以此而欲重贤良奋进，欲予以扶持党国，何可得也。既不能致信于人，而乃能勉为人用，其至必见笑而取辱矣。今先生来示督责中正，而欲强之回粤办学，窃恐先生亦为深思其所以然也。中正不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此虽中正避嫌远引，不敢干预一切，或蒙先生曲谅，不令兼任他务，以全其孤陋之治，然而势恐不能耳。是则中正来粤，先生纵或深信不疑，可无芥蒂，而于中正之处之道，不知如何而可也？

随着孙中山的逝世，蒋介石益发专擅自为，他处处以孙中山唯一传人自居，利用“廖案”，赶走胡汉民，排挤许崇智，发动中山舰事件，大扫汪精卫之威信。而其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击与之竞争的对手，以及箝制、约束他力量的中国共产党。

4. 陈炯明与蒋介石都具有军阀的本质，视军队为个人财产。早在1912年，陈炯明就采取排斥异己的方法，裁撤民军，造成己系军队一枝独秀，以增加他在革命阵营内的资本。广东反袁时，他一开始之所以举棋不定，也是出于保全实力一途。因此他事后对孙中山十分埋怨，“癸丑一役，我本不欲轻于一掷，徒以党义关系，不得不尔，至今思之，犹有余痛”<sup>②</sup>。

为了保证军队的私人化，陈炯明轻易不让别人染指，许崇智原是中华革命党军事部长，又是孙中山派去协助陈炯明的，陈却安排他去第二军。第二军的武器，人员素质较之陈亲率的第一军相差甚远，而凡是孙中山派遣的军事干部也都安排于此军，明显地受另眼看待。甚至第二军的一些骨干军官也多由陈炯明亲信担任。根本收不到指挥自如之效。

蒋介石对军队的重视也不亚于陈炯明，他之所以在陈炯明，后来在许崇智部下均不安于位，原因就是这些军队并不属于他，他梦寐以求地要求带兵，练兵，也就是想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他迟滞不回黄埔，另一个原因也是在要挟孙中山授予他办理军校的全权。直至廖仲恺谓“一切事已照介石意思办”，并告知孙中山也是如此态度，“先生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sup>③</sup>。

蒋介石接手黄埔后，不仅一意孤行，而且十分注重拉拢黄埔学生，在很短的时间，他就深入到学生中间，并赢得了威望。黄埔军校毕业生后来大都成了“天子门生”，除了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指挥不动。这正是他刻意造成的现象，也正是有这样一支强大的，私人属性极为浓厚的军队作后盾，才使他后来有了背叛革命的资本。

### 三

作为两位野心勃勃的人物，陈炯明与蒋介石也必然地要走上背离孙中山的道路。

但是，他们背离的方式却截然不同，陈炯明是公然犯上作乱，而蒋介石则依然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而背叛其真正的革命内涵。陈、蒋二人的结局也是截然相反，一个成了“党国叛逆”，一个后来则成为了国民党的“总裁”，并以孙中山的嫡系传人自居。

陈炯明是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就以实力派形象置身于革命阵营的。因此，当其个人利益与孙中山革命目标发生矛盾时，他倚恃自己的实力为资本，不断地向孙中山要挟。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失去广州地盘和军队流亡南洋，后悔自己之轻举，就对孙中山有过多诋毁，指责孙“沉迷于革命，不足以言救国也”。甚者，还打电报给袁世凯，表示愿意回广州招募军队，做袁世凯的外交后盾<sup>④</sup>。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活动，也无形中受到了陈炯明的阻挠和破坏，以致孙中山十分愤怒地指责“陈竟存于本党所为多所抨击，此人险诈，难于共事，所谓通融者直诳语耳”<sup>⑤</sup>。

尽管孙中山后来又和陈炯明再度携手，但其革命目标与陈炯明的私人野心毕竟难于调和。1920年10月，“援闽粤军”回师驱桂胜利之后，由于陈炯明势力上升，予智予雄，已基本蜕变为军阀武装，他与孙中山的矛盾就愈发尖锐而不可调和了。

两个人的根本冲突爆发于其战略方针的考虑，孙中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只是把广东作为革命基地而立志北伐，“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治长安。能出兵则可统一中国”<sup>⑥</sup>。但是孙中山的计划却遭到陈炯明的反对与阻挠，“余意此时固内当较北伐为尤急，因北伐之性质属暂时的，固内之性质是永久的。吾人当从事于永久事业，以期达到最先之的”<sup>⑦</sup>。

陈炯明反对北伐有他个人的目的：他既然有癸丑之役“轻举妄动”之后悔，因此，他当时最大的目标就是在粤省称王，其原因还是想保全实力，自问问鼎中原实力尚缺。另外，广东素为富庶之区，地域观念又特别强烈，打起联省自治的旗号颇合人心。他检讨说：“今日吾人已确信中国如再欲以君主政体或武力专制相统一，已断乎不能。袁世凯欲以帝制精神，治此共和国，既不可能，旋又思帝制自为，则竟身败名裂。段祺瑞及张勋，皆蹈此覆辙。孙逸仙博士亦尝有一时欲以武力统一中国，亦未成功”<sup>⑧</sup>。

在这里，陈炯明竟将孙中山的北伐之举与北洋军阀的称霸全国的野心混为一谈。因此，他明确宣布了自己的主张，“余以为今日中国形势，已日趋陷于危险地位，非唤醒国人根本上改造中国，不易挽救。顾中国版图辽阔，欲于最短时间，用一种方法而统一之，事实上实属困难，故余主张实行联省制度，各省自制省宪，共发展民治精神，以图邦治”<sup>⑨</sup>。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终于日益尖锐而最后爆发，这不仅是军事目标上的分歧，也是他个人割据思想与孙中山全盘战略目标、革命理想不能相容的必然结局。陈炯明坚持要“将广东变成一个封建领地”，而孙中山则立志要“彻底消灭国家一切混乱的主要根源——军阀主义”<sup>⑩</sup>，这两者之间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陈炯明之所以身败名裂，也与孙中山的崇高威信有关，鉴于此，北方军阀甚至对他也不重视，以为助陈“并不裨于大局，徒伤孙文派之感情，使统一进行益形艰难”<sup>⑪</sup>。另外，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口号也不合吴佩孚的口味。滇、粤、桂各军也利用孙中山威望，纷纷聚其旗下，组织反击。陈炯明公然叛变之举，陷自己于政治上道义上的孤立，“民胥咨怨，千夫所指，宜其亡也”。

在陈炯明与孙中山不断产生矛盾之际，蒋介石却作为同盟会一员后辈晚生，手无只兵地投身孙中山阵营。孙中山的宽厚以及对他的栽培，使他无论从思想上行动上都尚属循规蹈矩，他也自诩自己无党无派，惟知道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尽管也偶有矛盾，但从大局着眼，其表现还是颇受孙中山嘉许的。

由于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资本实力有限，他的野心尚局限在一定范围，构不成与孙中山

革命利益的根本冲突。从他后来的表现看，这一段时期尚属“韬光养晦”时期。对三民主义，他时时奉诵，对联俄联共政策，他皮里阳秋，表面上也予以赞同，声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sup>②</sup>。这些言论都给人一种“左派”的感觉。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仍没有丢掉孙中山这块金字招牌，言必称总理，称三民主义，并藉机抬高自己，他在祭总理文中，声情并茂地写到：“英士既死，吾师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执信踵亡，吾师并以执信之责任归诸中正，素怀澹泊，与俗鲜谐，不及早兴，辜负厚望，而今已矣，夫复何言？忆自侍从以来，患难多而安乐少，每于出入生死之间，悲歌慷慨，唏嘘凄怆，相对终日，以心传心之情景，谁复知之。……而今而后，岂复有生人之乐趣乎？朝闻道，夕死何憾，主义不行，责任未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sup>③</sup>。

另外，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已无一人具有孙中山之威信，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诸人，尽管资深功高，但其威望影响均不能与孙中山同日而语，不足以号令全党，影响全国。更不幸的是，胡汉民思想右倾，汪精卫利欲熏心，廖仲恺英年早逝，在这种情况下，有助于蒋介石纵横捭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乘机弄权，终至脱颖而出，从而掌握了党政军最高权力，实现了他个人的野心，并最终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主义。

综上所述，由于陈炯明与蒋介石在个人野心上的相似之处，他们必然要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同样由于个人野心的冲突，陈炯明势必不会让蒋介石染指自己的部队，而蒋介石也视陈为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这一矛盾，双方则以各自不同的表现形态构成整个事物的客观发展过程。

①②④ 鲁直之：《陈炯明叛国史》第2、304、12页。

③⑤ 陈演生编：《陈竞存先生年谱》第6、8页。

⑥ 钟德胎：《陈炯明在广东》，《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9期。

⑦ 上海《民国日报》1917、6、10日；1921年2月18日。

⑧ 《孙中山全集》第4卷530页。

⑨ 罗香林：《乙堂文存》第49页。

⑩⑪⑫⑬ 《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2卷第206、222、249、224页。

⑭⑮⑯⑰⑱ 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1918年9月、1921年9月17日、1908年、1909年、1902年，均见年谱当日记载。

⑲ 《蒋介石致孙中山函》1921年3月5日。

⑳ 《章太炎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㉑⑲ 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日。

㉒ 《北京大学周报》1925年5月1日。

㉓ 刘德喜：《苏中关系文件集》。

㉔ 《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25年2月。

㉕ 《胡汉民复蒋介石皓电》1925年2月。

㉖ 《广东国民政府贺电》1925年11月10日。

㉗ 《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

㉘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㉙ 蒋介石：《黄埔第三期同学录序》。

㉚ 《有关陈炯明资料》。

㉛ 见廖仲恺1925年8月致蒋介石诸电。

㉜⑳⑳ 《孙中山全集》3卷209—210页；第5卷598页；第6卷525—526页。

㉝⑳⑳ 《晨报》1921年10月9日、1922年12月20日、1922年11月12日。

㉞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训话》1925年4月9日。

㉟ 《蒋介石祭总理文》1925年3月30日。